

“驾考理论通不过不用怕,来我这里有帮助,不过退全款。”这样的承诺究竟是信口雌黄还是确有“万全之策”——驾考背后的“黑色产业链”

顺藤摸瓜
牵出“黑色产业链”

2022年10月21日,在张家港市驾考中心科目四考场内,考生李某神色慌张,右手反复翻动着左侧衣领,并时不时微微抬头张望着巡考的工作人员,左手则连续点击着鼠标,这一幕引起了考试中心工作人员的警觉。工作人员经近距离观察发现李某的衣服上藏着秘密,便将这一情况告知了警方。

被衣领盖住的微型摄像头、藏进耳朵的米粒耳机、绑在左臂的电池和信号接收器,民警在考生李某身上查获了一套完整的“神器”,他随即招认了作弊事实。

“我年纪比较大,记性也不好,一直担心考不过。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驾校教练李某,他说是可以包过的。”李某在李某的安排下,借着作弊“神器”顺利通过了驾考科目一的理论考试,不承想到了科目四这最后一步,东窗事发。

在调查该案的过程中,侦查人员意识到,能通过微型摄像头实时拍摄考试内容并传输出去,再通过信号接收器、米粒耳机接收传回的答案,这种远程作弊方式仅凭考生和教练两个人是办不成的。考虑到该男子科目一考试作弊未被发现,李某更是在考试前自信地打出“考试包过”的承诺,说明组织作弊的方式非常熟练、隐蔽,背后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分工明确的驾考作弊团伙。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侦查人员有了更惊人的发现,这个作弊团伙不光人数众多,分工明确、长期未被发现,犯罪足迹更是遍布扬州、镇江、苏州等地。至此,一个牵涉多地、蛰伏许久的组织驾考理论科目作弊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发展迅速
形成严密的作弊组织

2014年,孙某甲就组织过驾考理论科目作弊,但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组织作弊入刑后就停手了。到了2018年,因生意不好欠下外债,孙某甲萌生了重操旧业赚“快钱”的念头。

有了想法以后,孙某甲联系了堂弟孙某乙、外甥李某以及朋友周某、顾某等人,商量成立了一个驾考作弊小团

2018年至2022年,孙某甲伙同孙某乙、李某、周某等人在江苏多地长期从事组织驾考理论科目作弊的违法犯罪行为,获利17万余元,严重违反了国家考试的相关管理制度,也对道路安全产生了不良影响。

2024年1月4日,由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孙某甲等人组织考试作弊案在法院开庭审理,法院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主犯孙某甲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0万元,判处其他成员有期徒刑、拘役以及并处罚金等刑罚,相关违法所得均被没收上缴国库。



新华社发

体。几人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孙某甲负责谈业务找客源,孙某乙负责准备作弊设备,李某、周某、顾某则负责远程答题,通过作弊设备把答案传递给考生。该5人团体成立后,开始从扬州部分驾校寻找机会,瞄准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理论考试通过难度大的考生,宣称“驾考理论通不过不用怕,来我这里有帮助,不过退全款”,以此吸引这些考生的注意。他们每成功帮助作弊一场考试,就向考生收取600元至2000元不等的费用,逐步形成了一条驾考界的“黑色产业链”。

此后,这个驾考作弊团伙逐渐发展壮大,不仅扩大了经营地域,从扬州发展到苏州等地,还拓宽了客源渠道,直

接找熟悉的教练进行合作,每成功介绍一名有作弊需要的学员,给教练300元到1000元不等的好处费。在镇江,该团伙甚至直接与当地几个驾校校长联系,由驾校校长指派驾校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为该团伙批量介绍考生。这样的经营方式可谓是“双赢”——犯罪团伙拥有了源源不断、主动上门的客户,驾校的通过率则有了保障,在本地影响力也逐渐扩大。

四年间,该组织驾考作弊团伙逐渐形成了“总部提供技术设备—地方总代理居间介绍—驾校教练招揽客户”的经营模式,涉及的驾校教练有20余人。长期组织驾考作弊的行为致使驾考理论考试形同虚设,不仅触碰了法律红线,

1.9万余张操作证造假! 安全生产如何拦住“隐形杀手”

不用参加培训和考试,提供身份信息花费几十元到几百元,即可拿到一张带“公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扫描证件上的二维码,弹出的“官方”网站还可在线验伪……

记者采访获悉,北京检察系统近期查办一起特大伪造特种作业操作证案件;该案中,超过1.9万人购买了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涵盖39种高风险作业。目前,部分犯罪嫌疑人已被提起公诉。

近2万名高风险作业人员
购买假证

北京市西城区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此前在某项目工地检查时发现,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白某某持有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为假证件。

经查,白某某在未经专业培训及资格考试的情况下,花500元在网上购买了假证。扫描假证上的二维码,跳转的查询网站并非官方网站。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于伟香说,犯罪团伙开设的虚假网站后台数据显示,有超过50万人关注该网站,超过1.9万人购买了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施工工种涵盖电气焊、高空作业、起重、信号等39种高风险作业。

为精准摸排假证是否已流入工地、流入数量和具体点位,北京市检察系统快速构建起大数据模型。“我们将虚假网站中提取到的假证人员信息与有关部门的查询平台数据进行比对,持假证从事特种作业人员及其工地情况一目了然。”于伟香说。

26岁的主犯孙某某仅有初中学历。孙某某供述,为牟取不正当利益,他从网上雇人搭建网站。制假人员只需在网站后台管理页面填写身份信息,就会自动生成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扫描证件上的二维码,会打开假官方网站,国徽、机关名称、假证有效期、工种信息一应俱全。

孙某某说,电子版假证通过社交软件传送,实体版证件则通过外地犯罪人员制作后邮寄。

“上游人员建立、维护假冒网站,各级中间人层层发展下线,一个假证制作成本大概10元,卖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利润可观。”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助理检察官张欣说。

安全生产的“保障证”为何层层失守?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因为从业人员持有假证或未取得证件违规作业酿成的事故屡见不鲜。

例如,2020年11月6日,长春世鹿鹿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火灾事故致5死1伤,原因系电焊作业引燃易燃保温材料,其中3名无证人员违规上岗作业;2023年4月17日,浙江伟嘉利工贸有限公司发生重大火灾事故致11人死亡,事故起因也系电焊施工引燃堆放存放的拉丝调制漆,4名无证电焊作业人员事后被刑事拘留。

“特种作业环境复杂,风险大,只有全面了解作业规范和安全措施,学习应急处理方法和自我保护技巧,才能减少风险事故。”张欣说。

那么,为何一些人愿意铤而走险办假证?

据业内人士介绍,特种作业用工需求旺盛,范围广、种类多,发证机关既有应急管理部门,也有市场监管、住建部门,目前尚没有能全部覆盖的查询网站,用人单位查询不够便利;多部门分管也易形成“各管一摊”,发现和打击难。

一名建筑企业负责人表示,假网站和官网很相似,部分企业和工地管理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对于证件真伪查验力度不足;有时工地上急于用工,并未仔细查验。

此外,特种作业属于“熟人”行业,亲朋好友相互介绍较多,“认脸”胜过“认证”,用工时容易浑水摸鱼。于伟香介绍,一些犯罪嫌疑人并非以营利为目的联系他人制作假证,有时仅为“方便”或“义气”,为工友办理假证,自以为帮了别人忙,实际上是法律知识不足、法律意识淡薄。

一些工地还存在上级主动提出给下级办假证的情况。在孙某某案中,北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因为从业人员持有假证或未取得证件违规作业酿成的事故屡见不鲜。

受访专家和法律界人士建议,应进一步从严查处违法行为,严格证件发放和查验管理制度,从源头端遏制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多方共管打好“组合拳”。

新华社发

京某公司一名项目经理为拓展业务,快速获取业绩,通过购假手段,主动为员工非法办理叉车证20余张。

违法成本较低,威慑程度不够,也是缘由之一。按照《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生产经营单位非法印制、伪造、倒卖特种作业操作证,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特种作业人员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多方合力筑牢安全生产底线

受访专家和法律界人士建议,应进一步从严查处违法行为,严格证件发放和查验管理制度,从源头端遏制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多方共管打好“组合拳”。

广东格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倩认为,当前针对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应对非法印制、伪造、倒卖以及冒用、借用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不法行为加重处罚。

更是增加了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对他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宽严相济
根据具体情况分层处理

2023年3月3日,该案被移送至张家港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事实上,该团伙流窜作案,每次作案到作弊地点参与作弊的人员都不固定,时间跨度很长。在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很难记清为哪些教练的哪些考生提供了作弊帮助,教练也记不清具体为自己的哪些学员组织过考试作弊。”办案检察官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发现,对该团伙组织考试作弊的次数和违法所得的金额认定难度很大。

面对上述难题,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举行多轮案件会商,办案检察官仔细分析案情,认为涉案人员到作弊考生所在城市组织考试作弊时必然要入住当地的宾馆酒店,作案时不会单独行动,于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认定思路:只要有两名以上团伙人员同时入住犯罪地酒店就可以认定为参与组织考试作弊。

以此为切入点,检察官撰写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补充团伙成员在作弊地的住宿记录、车辆缴费记录、分账金额及时间等证据,确定该团伙主要犯罪成员组织考试作弊至少150余次,累计获利17万余元。

在案件审查过程中,检察机关慎重区分涉案人员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参与作案次数、参与程度高低、有无非法获利等情况,对于参与次数少、作用小,且从未从中非法获利的人员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驾考作弊的组织者根据作案次数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经办案检察官多次向犯罪嫌疑人释法说理,最终该案全部犯罪嫌疑人都认罪认罚。2023年8月7日,张家港市检察院对孙某甲等32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均得到法院判决支持。

目前,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在考试过程中作弊的考生已作出取消考试成绩且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已取得驾驶证的作弊考生作出收缴驾驶证并处罚款、三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相应的处罚。

据《检察日报》

记者前不久在北京市多条街道调查采访时发现,在一些人行道的地面上、共享单车上,有不少类似“同城美女上门服务”等涉黄涉诈小卡片。

这些让众多城市都感到头疼的小卡片,有着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近些年来,各地经过长期治理,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犹如城市“牛皮癣”的小卡片,至今仍未得到根治。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孙煜华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打击涉黄涉诈的非法小卡片,需要多措并举加以整治,“动员社会公众主动发现、投诉和举报,为执法部门提供涉黄涉诈信息;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公安、城管、通信管理等多个部门各司其职、联合发力;加强信息引领、科技赋能,及时封停涉黄涉诈的微信账号、QQ号、二维码、电话号码”。

多为不法分子骗局诱饵

“扫码选妃,上门服务”“本地大学生兼职上门”……国家反诈中心前不久发布了一则整治贴“小黄卡”的视频,揭露了相关手法和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展示了警方打击治理非法小卡片的决心。

近年来,多地重拳打击涉黄小卡片违法犯罪活动,并顺藤摸瓜挖出多个招嫖卖淫团伙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2023年3月,江西省抚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民警在“春雷行动”中雷霆出击,通过招嫖小卡片循线深挖,成功打掉一个以卡片和网络聊天软件作为主要招嫖媒介的介绍卖淫团伙,抓获涉黄违法犯罪嫌疑人22人。

2023年4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成功摧毁以发放涉黄卡片招嫖为名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共抓获涉案人员10人,收缴扣押涉案电脑、打印机等作案工具多台。

2023年8月,青海省公安厅网安总队会同西宁市公安局网安部门成立的专案组进行收网,警方在西宁市城东区一宾馆内抓获4名违法人员,当场查获多张涉黄小卡片和专用打印机1台。经审查,该团伙累计张贴涉黄小卡片4万余张,非法获利3.2万元。

多地公安机关在侦办此类案件时指出,非法小卡片绝大多数是不法分子的骗局诱饵,或是存在招嫖、卖淫等行为,或是有着网络刷单、网络赌博、裸聊敲诈等“套路”。社会公众要保持警惕,不要轻信卡片内容,以免上当受骗造成财产损失。

多种原因导致难以根治

非法小卡片污化社会风气,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多地对此始终保持常态打击态势。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非法小卡片经常在专项治理后又“死而复生”,犹如城市“牛皮癣”一般难以根治。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防控中心民警高铭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与传统线下卖淫嫖娼相比,城市小卡片等网络招嫖难以根治有多种原因:

地点区域不限定,发现难度大。小卡片招嫖没有固定场所、交易时间和交易地点,交易即完即走和跨区域交易是常态,招嫖团伙可根据嫖娼人员需求全天候全区域安排交易。

招嫖号码实名但不实人,摸排难度大。组织者通过网络大量购买实名但不实人登记的电话号码,并注册微信号、QQ号实施招嫖,一旦发现业务号码被停用,就立即停用原号码并启用其他号码,加大侦查难度。

违法犯罪经济成本低。招嫖卡片制作成本低廉简单,招嫖团伙可单次大量印刷、大肆散发。招嫖团伙大多雇佣流浪或辍学人员作为发卡主力,且一般无固定经营场所,日常管理成本低。

团伙异地合作,打击难度大。招嫖团伙往往采用微信、QQ等方式联系,团伙成员大多异地分工合作,线下接触少,增加了链条打击难度。

部门协同不足,难以根治。目前卡片招嫖的治理以公安打击为主,其他职能部门参与度不高不深,彼此之间以及同一主体之间内部情报信息传递不畅,缺乏内部协同治理机制,难以根治。

科技赋能提升打击成效

近年来,从一线城市到县城,都多次针对非法小卡片进行整治。2023年,浙江、重庆、山西、河南、海南、广东等地都重拳打击涉黄小卡片违法犯罪活动。

针对城市非法小卡片,多地公安部门坚持通过强化专案打击、社会面巡逻防控、行业管理、挂牌整治等工作,保持常态打击态势。记者注意到,信息技术被越发频繁地应用到各地的整治工作中。

重庆市公安局2022年在关于市政协五届五次提案办理情况的答复函中介绍说,重庆市公安局加大了在“信息引领,科技赋能”管理模式领域的创新和探索,自主创新研发了“断黄卡”微信小程序,并积极协调腾讯公司和市通信管理局对涉黄的微信账号、QQ号、二维码、电话号码等及时封停。同时,切实加强对相关数据的分析研判,进一步提升对散发色情卡片违法犯罪活动的预警、循线追踪、精准打击的成效。

智能技术的应用,对于治理非法小卡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023年初,武汉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会同腾讯公司,以警企共创的方式,合作开发“扫黄一点通”,该微信小程序上线半年的时间里,共接到群众举报涉黄微信号、QQ号、手机号、二维码等账号3万多个,警方研判分析线索、循线深挖,先后破案163起,抓获违法人员425名。

“这种集采集、封停、研判、打击于一体的网络招嫖打击新思路,对于精准打击城市非法小卡片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高铭泽说。

腾讯“城市小卡片治理项目”负责人杨柳介绍说,以微信小程序为载体,腾讯开发了一套小卡片账号自动化采集和快速处置系统,帮助公众通过手机拍照上传的形式,快速对城市非法小卡片进行举报;同时依托腾讯安全技术能力,实现对违规信息的识别、处置,涉及刑事风险的依法配合公安机关进行打击。

完善联合整治工作机制

孙煜华指出,非法小卡片难以根治,有着多个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两个原因最为重要——发现难、协同难。“运用科技手段,可以解决发现难的问题。而协同难的问题,则需要通过完善协同机制来实现。”

近年来,多地在开展非法小卡片清理专项行动过程中,采取公安、城管、文化执法、通信管理等多部门协同的方式进行严厉打击,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且,一些地区之间也加强了合作,比如,长三角建立“扫黄打非”联防联控机制,京津冀深入开展“扫黄打非”联防联控。

“一方面,城市治理要建立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并创建网格化社会治理责任模式,明确各部门相关职责,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地带;另一方面,可以探索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从而更好推动解决跨区域的问题。”孙煜华说。

高铭泽认为,城市非法小广告问题是社会现象,重打轻管是“治标不治本”,需要统筹政法、教育、城管等多家单位协同管理,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才能更好推动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解决城市非法小广告问题,需要推动公安、宣传、城管、电信等部门进一步完善联合整治工作机制,尤其是完善跨部门的数据信息共享和流程互联互通。同时,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职能作用,及时清除色情卡片,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上门服务」小卡片涉黄涉诈
完善协同治理机制破解治理难题
专家建议

据《法治日报》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